

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

70TH ANNIVERSARY OF

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

历史的节点 调整

THE KEY POINTS IN HISTORY

罗平汉◎著

见证

新中国成立后

每一个十字路口的

抉择和走向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历史的节点·调整

THE KEY POINTS IN HISTORY

罗平汉◎著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的节点·调整/罗平汉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8

ISBN 978-7-224-12656-3

I. ①历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中国共产党—党史—研究 IV. ①D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31794 号

出品人: 惠西平

总策划: 宋亚萍

策划编辑: 刘景巍

责任编辑: 王亚嘉

左文

封面设计: 周国宁

历史的节点·调整

作者 罗平汉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印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 787mm × 1092mm 16 开 24.2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 366 千字

版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4-12656-3

定价 65.0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探析 / | 1 |
| 1958—1962 年粮食产销的几个问题 / | 32 |
| 共和国历史上一场特殊的运动 / | 57 |
| 特殊年代的特殊发明 / | 73 |
| 1960 年底至 1961 年初的农村整风整社 / | 86 |
| 1961 年广州中央工作会议述论 / | 104 |
| 周恩来邯郸农村调查 / | 128 |
| 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十八天调查 / | 142 |
| 朱德与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 / | 162 |
|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下放 / | 174 |
| 20 世纪 60 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兴起与夭折 / | 192 |
| 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城镇人口精简 / | 227 |
| 麻雀从蒙冤到平反的曲折历程 / | 252 |
| 七千人大会与民主集中制 / | 270 |
|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/ | 282 |
|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 / | 310 |
| “四清”运动述评 / | 326 |
| 农业学大寨运动始末 / | 365 |

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探析

“大跃进”运动之所以持续三年之久，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极为关键。这次会议原本是纠“左”的，在会议快要结束时，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“大跃进”问题的信，结果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，会议的主题也就从纠“左”变为“反右倾”，并在庐山会议后启动新一轮“大跃进”，直到1960年底，由于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，“大跃进”才不得不停止，转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。那么，如果彭德怀不写这封信，是否纠“左”就能够坚持下去，“大跃进”就能够中止，所谓“三年暂时困难”就不会出现？为什么彭德怀这封不过是反映问题的信，却使会议的主题发生根本性的转换？有人甚至讲，毛泽东之所以在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，是因为彭在朝鲜战场上没有保护好毛岸英之故。笔者认为，这是没有史实根据的推测。庐山会议后期主题的转换，以下几个因素至关重要。

一、庐山会议前对“左”的纠正有限

客观而论，毛泽东既是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，也是中共领导人中较早发现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许多问题者。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不久，毛泽东曾到天津找河北省保定地区的一些县委书记谈话，了解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，事后他还让中共河北省委组织调查组对徐水县进行了调查，并听取了中共河北省委对调查情况的汇报。他通过调查了解，发现很多人“急急忙忙往前闯”，脑子中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，认为有必要让各级干部冷静下来。

为了解决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，1958年11月2日至10日，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，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，由此开始了半年多的纠“左”工作。会议开始后，毛泽东多次找到会的省委书记谈话，做高级干部的“降温”工作。会上，毛泽东提醒那些头脑发热的高级干部说，苏联搞了40年的社会主义，还没有宣布进入共产主义，中国才搞几年的社会主义，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地宣布过渡。毛泽东还号召各级干部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，认真读斯大林的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和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》两本书，以“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”。

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。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，破除迷信，不能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。凡是迷信，一定要破除，凡是真理一定要保护。必须老老实实，不要弄虚作假，要压缩空气。对于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，毛泽东强调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必须分清，不能混淆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是一个界限，也必须分清，不能混淆。

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的基础上，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，全会通过了《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》，强调农业社变为人民公社，不等于已经把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，要在全国农村实现全民所有制，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；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，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变成共产主义，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，比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，需要经过更长的时间。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，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，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。这次会议之后，各地开展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。

接着，中共中央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重点研究人民公社问题，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。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，在分配中要承认队与队、社员与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，穷队和富

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。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，三级所有，三级核算，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，在社与社、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。随后，毛泽东多次致信给各级党委，强调要下决心去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“共产风”。

3月25日至4月1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，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做准备。上海会议检查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情况，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的问题。会议还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。有与会者提出应利用即将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，公开修改过去宣布的过高指标，但由于当时“大跃进”的问题尚未充分暴露，许多人对高指标仍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，这个建议未能为会议所采纳。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1959年计划中，只降低了基本建设投资，其他的高指标大都未变。

1959年第二季度，国民经济中比例失调造成的严重后果进一步暴露出来。首先是农业生产情况很不好，夏收粮食、油料大幅度减产，蔬菜、肉类等副食品短缺。其次是钢铁生产上不去，1959年头四个月按计划应该生产钢600万吨，实际只完成336万吨。由于“以钢为纲”，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轻工业被挤占，日用品生产下降，许多商品库存减少，造成供应紧张。针对这种形势，1959年5月中旬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陈云的建议，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由1800万吨降为1300万吨。同时，中共中央还调整了农村政策，决定恢复社员的自留地，允许社员饲养家畜家禽，鼓励社员充分利用屋旁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种庄稼和树木，不征公粮，不归公有。中共中央还明确指出，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，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。允许这种小私有，实际上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，并不是“发展资本主义”。

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，第一次郑州会议之后半年多的时间，农村人民公社经过几个月的整顿，逐渐剥去了一些空想色彩，刹住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，“共产风”得到了初步的遏制，许

多混乱不清的政策问题得到了明确，党同农民的关系有了改善；工业领域一些过高的指标降了下来，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做法被中止。所有这些，都是值得肯定的。

但是，在对庐山会议前的纠“左”工作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，也应看到当时对“左”倾错误的纠正其实相当有限，尤其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的问题。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客观规律。虽然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也强调“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”，但他所批评的是那种急急忙忙取消等价交换、混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界限的做法，而没有认识到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，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的“跃进”式发展，而且会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的失衡；也没有认识到在生产水平还不具备改变生产关系的情况下，就建立“一大二公”为主要特征的人民公社，本身既违背经济规律，也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。所以，庐山会议前半年多时间的纠“左”，不是纠正指导思想上的“左”，而是纠的一些具体问题的“左”。当时，中共中央领导层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，对总路线、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仍是充分肯定的，认为这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了不起的创造，问题主要是基层干部在贯彻执行这“三面红旗”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，如有的指标提得过高，刮了一阵“共产风”，过早把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等。只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了，就可以取得新的更大的“跃进”，人民公社就可以巩固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优越性就能更好地发挥。

还应该看到，“大跃进”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。1956年的反冒进，本是得到了中央领导层多数人赞成，可以说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决策，但由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有保留意见，到反右派运动快结束的时候，他认为反冒进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，挫伤干部群众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，于是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，一再对反冒进进行批评，而原本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只得再三做检讨。毛

泽东批评反冒进实际上是对中央集体决策的否定，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，助长了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和个人崇拜的发展，这就使得领袖的个人意志已经代替了中央的集体决策，一些正确的意见很难反映到中央并被采纳。因此，当时纠“左”的程度取决于毛泽东对于“三面红旗”的认知态度，当毛泽东认为应当纠“左”的时候，于是全党上下进行纠“左”，而毛泽东认为应当反右倾的时候，于是全党又紧跟他开展“反右倾”。

二、对形势的不同看法促成会议的转向

众所周知，庐山会议主题的转换起因于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那封信。这封三千字的长信分为两个部分：一是认为“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”；二是谈及“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”。长信在肯定总路线、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绩的前提下，信中着重指出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问题，特别是全民炼钢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，是“有失有得”，提出应当总结发生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。信中指出：“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，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。就其性质看，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、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，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。”对于前一阶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信中指出，客观原因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，没有完整的经验，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没有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。主观原因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有不少问题，突出的是“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”，“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”；同时也由于“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”影响，从而使“一些‘左’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，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”。信中还说：“纠正这些‘左’的现象，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。”“要彻底克服，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。”

“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，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，甚有益处。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，提高思想，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。”^①

在这封信中，引起毛泽东不满的主要是这两段话。一段话是：“在全民炼钢铁中，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，浪费了一些资源（物力、财力）和人力，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。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，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，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。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（贴补20余亿）。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。”另一段话是：“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，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。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，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，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，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，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，抢先思想（按：指抢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，引者）一度占了上风，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。”^②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表示，信上说“有失有得”，把“失”放在“得”的前面，反映了彭的灵魂深处。还说彭在信中讲“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”，主要锋芒是向着中央领导，是反中央、攻击中央。^③

毛泽东之所以对彭德怀信中的“有失有得”不满，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彭德怀对“大跃进”的批评超越了他所能接受的程度。1958年初，毛泽东曾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——《工作方法六十条（草案）》，其中提出：“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，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。”他说：“我们的工作，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，成绩总是主要的。”对工作中的缺点与失误，不能采取“攻其一点或几点，尽量夸大，

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：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第12册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444—446页。

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：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》第12册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442—443、445页。

③ 《黄克诚自述》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256页。

不及其余”的做法。^①在毛泽东看来，对待1958年的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，也应当是这样，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，以高速度为核心的“大跃进”，以及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的人民公社，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，但这“三面红旗”本身是正确的，它使中国找到了快速建设社会主义、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有效途径，问题是一些干部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过急过快，发生了偏差。因此，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成绩是主要的，是九个指头；“共产风”、浮夸风等问题客观存在，应当纠正，但与所取得的成绩比，只是一个指头，只要把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解决了，就能够实现更大的跃进。而彭德怀信中说大炼钢铁“有失有得”，在毛泽东看来，将“失”放在前面，使用的就是“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”的做法，反映出彭在“灵魂深处”对“三面红旗”的反对，这恰是一向对“三面红旗”高度评价的毛泽东所不能认可的。

庐山会议的主题原本是纠“左”，可是，由于彭德怀的这封信却导致会议主题转变为“反右倾”，并在随后启动新一轮的“大跃进”，造成了比上一轮“大跃进”更严重的后果，于是有人假设，如果彭德怀不写这封信，会议的结局也许是另一种情形。然而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。实际上，庐山会议前期的纠“左”很有限，而且纠“左”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“大跃进”。因此，即使没有发生彭德怀上书的事件，庐山会议也不可能对已经发生的“左”倾错误从根本上加以纠正。彭德怀之所以向毛泽东写信，就是鉴于庐山会议对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，对一年多的经验教训分析、总结不够，以及对会议中存在的“护短”现象感到很担忧，又觉得有些话不便在小组会上讲，如果这些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重视，由毛泽东“再从（重）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，这些问题就可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”^②。所以，庐山会议后半段固然中断了纠“左”的进程，但庐山会议的前期并没有真正解决纠“左”的问题，即使彭德怀不写这封信，会

① 《毛泽东文集》第7卷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357—358页。

② 《彭德怀自述》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275页。

议如期结束，“大跃进”也不会中止，人民公社的问题也难以真正解决，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仍会出现。当然，经济困难的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，因为庐山会议后的新一轮“大跃进”，实际上带有某种赌气性质。

在彭德怀上书之前，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，认为工作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，但并不是很严重。6月13日，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，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。他在讲话中说：“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。谁知道吹‘共产风’？根本不管价值法则、等价交换，一办公社，‘共产风’就吹出来了，没有料到。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，我也没有料到。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。粮食那么紧张，去年大丰收，今年大紧张，也没有料到。要随时注意新问题，发现新问题。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，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，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。”他还说：“我到井冈山，头一仗就是打败仗。这是一个好经验，吃了亏嘛。”^①毛泽东的意思很清楚，不要因为在“大跃进”中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受到一些影响，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“共产风”的问题，就否定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，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没有经验造成的。

庐山会议开始后，毛泽东提出了会议需要讨论的18个问题，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形势的看法，实际上也是如何评价前一阶段的“大跃进”。在6月27日的讲话中，毛泽东说：国内形势是好是坏？大形势还好，有点坏，但还不至于坏到“报老爷，大事不好”的程度。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？我看要坚持。总的说来，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，是两句话：“有伟大的成绩，有丰富的经验。”“有丰富的经验”，说得很巧妙，实际上是：有伟大的成绩，有不少的问题，前途是光明的。基本问题是：（一）综合平衡；（二）群众路线；（三）统一领导；（四）注意质量。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。要注意质量，宁肯少些，但要好些、全些，各种各样都要有。农业中，粮、棉、油、麻、丝、烟、

^①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：《毛泽东传（1949—1976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948—949页。

茶、糖、菜、果、药、杂都要有。工业中，要有轻工业、重工业，其中又要各样都有。去年“两小无猜”（小高炉、小转炉）的搞法不行，把精力集中搞这“两小”，其他都丢了。去年大跃进、大丰收，今年是大春荒。现在形势在好转，我看了四个省，河北、河南、湖南、湖北，大体可以代表全国。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，这是一个好现象。

他又说：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，哪个形势好？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“共产风”，今年不会刮，比去年好。明年“五一”可以完全好转。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，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。有人说，你大跃进，为什么粮食紧张？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卡子？现在讲不清楚，促进派也讲不清楚。说得清楚就说，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，去干。明年东西多了，就说清楚了。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，不是两条腿走路。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，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，反而搞一条腿了。在大跃进形势中，包含着某些错误，某些消极因素。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，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。去年形势本来很好，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，只想好的方面，没有想到困难。现在形势又好转了，盲目性少了，大家认识了。^①

7月10日，毛泽东召集各小组长会议并做了长篇讲话，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，“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，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”^②。他说：“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，就不能团结。要党内团结，首先要思想统一。党外右派否定一切，说我们‘人心丧尽了’，‘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（指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——引者），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’；说‘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，减税薄赋，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’。所谓丧尽了，就是不仅资产阶级、地主，而且农民、工人都不赞成了。天津有些局长、科长议论，去年大跃进是‘得不偿

① 《毛泽东文集》第8卷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76—77页。

②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：《毛泽东传（1949—1976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971页。

失’。是不是这样？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，要帮助他们认识。得的是什么？失的是什么？比如说，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。不要戴帽子，不要骂一顿了事。”“党内要团结，就要把问题搞清楚。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。所谓总路线，无非是多快好省，多快好省不会错。过去搞一千九百项基建，现在安排七百八十八个，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？一千八百万吨钢不行，现在搞一千三百万吨，还是多快好省。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，但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（1957年的粮食产量为3901亿斤，1958年是4000亿斤，实际增加99亿斤，增长2.5%，引者）。多快是一条腿，好省又是一条腿。”

对于前一阶段的成绩和错误的问题，毛泽东说：“我们把道理讲清楚，把问题摆开，也不戴帽子，什么‘观潮派’、‘怀疑派’、‘算账派’、‘保守派’等等，都不戴。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。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。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、一个败仗就是好的，有威信。两败一胜就差一些。打了败仗，可以取得经验。要承认缺点错误。从局部来讲，从一个问题说，可能是十个指头，九个指头，七个指头，或者三个指头、两个指头。但从全局来说，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。要找问题，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。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，就是这样：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。”^①

从这些讲话中可以看出，毛泽东认为，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虽然也有缺点和不足，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与取得的成绩相比，只是一个指头，成绩无疑是九个指头。毛泽东此时的态度是：“‘左’的错误要批评，但不应总是抓住不放；对热心搞‘大跃进’的同志，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，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；现已经批了9个月的‘左’，差不多了；应

^①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：《毛泽东传（1949—1976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971—973页。

赶快抓生产，争取1959年的跃进。”^①

很显然，彭德怀信中对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的评价，与毛泽东所说的“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”有着相当大的差距，特别是其中所说的“有失有得”，在毛泽东看来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、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的否定，这恰恰是他所不能接受的。而且在毛泽东看来，彭德怀主要负责军事工作，又没有参与已进行了半年多的纠“左”，现在，纠“左”取得了很大成效，对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也有了足够的重视，“彭德怀等不是跟他一道去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，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，是对他和党中央的领导‘下战书’，因而是右倾的表现”^②。

8月16日，也就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闭幕式上，毛泽东说：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。总结经验应该这样总结法才好，就是锋芒对着右倾。从1958年11月起，落实指标，反对“共产风”，不断地批评，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。“而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，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，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，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，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，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，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、中央全会上提意见，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。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。问题都解决了，或者剩下尾巴，情况好转了，我说，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。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，而在这个时候提呢？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。”“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，他们来提，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，就没有机会了。再过几个月，时局更好转，他们就不好办事了，他们的扩大队伍、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

① 薄一波：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》下卷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851页。

② 胡绳主编：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432页。

了。”^①毛泽东的上述讲话，可以说从一个角度对庐山会议为什么从反“左”一下转为反右作了注解。毛泽东认为，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大半年里，他一直致力于纠“左”，这方面的“问题都解决了，或者剩下尾巴，情况好转了”，因而对彭德怀写信的动机产生质疑。

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不满，其实不仅仅是7月14日的这封信，还与此前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不无关系。如他说：“解放以来，一连串的胜利，造成群众的头脑发热，因而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。在大胜利中，容易看不见、听不进反面东西。”“要找经验，不要埋怨，不要追究责任。人人有责，人人有一份，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。我也有一份，至少当时没有反对。”“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，而是个人决定；第一书记决定的算，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。不建立集体威信，只建立个人威信，是很不正常的，是危险的。”“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威信这高，是全世界找不到的。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。去年乱传毛主席的意见，问题不少。”^②

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《毛泽东传（1949—1976）》所评论的：“如果没有彭德怀那封信，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激烈的程度。这样看起来，事情似乎带有一定的偶然性。但是，由于毛泽东的‘左’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，纠‘左’纠到一定程度，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，就会提出反右的问题，这又是不可避免的。”^③

虽然毛泽东在会议一开始，就对形势问题定了调，即“有伟大的成绩，有不少的问题，前途是光明的”，但从彭德怀的信中看出，与会人员对形势的估计存在明显的分歧。在此前后，党内党外对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的不少否定性意见，也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。

^①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：《毛泽东传（1949—1976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006—1007页。

^② 《彭德怀传》编写组：《彭德怀传》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588—591页。

^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：《毛泽东传（1949—1976）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010页。

1959年5月，当讨论第二次郑州会议、上海会议巩固人民公社的方针时，中共江西省委党校80多个县委一级干部通过大鸣大放，有人认为人民公社建立太快了，是早产儿；人民公社违背客观规律，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，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，人民公社没有合作社优越，缺点大于优点，公社是空架子，是金字招牌。“共产风”是上面刮下来，中央、省、地委应负责任。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提得过早，应该取消；公社目前不能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，应以农业生产为主；公共食堂不是共产主义因素，害多利少；等等。

中共中央宣传部这年6月20日编印的《宣教动态》第45期上，刊登了《否定和怀疑1958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》一文，其中讲到，天津部分党员干部认为，1958年的全民炼钢是得不偿失，农业上粮食不够吃，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，党的威信不如过去高了；“大跃进”是工业跃进了，农业没有跃进；政治跃进了，经济没有跃进；人民公社走得太快，对农民的觉悟估计过高，忽视了农村的现实条件，主观愿望超过了客观现实等。

1959年6月9日，原国家建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、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李仲云，就目前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。信中直言不讳地说，最近一年来，我们的工作中犯了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错误，其原因主要是在思想上忽视了两条战线的斗争，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，忽视了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侵袭，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，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。信中列举“左”倾冒险主义的主要表现，如将以钢为纲变成以钢为一切，全民大搞土法炼铁的运动是一条失败的经验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；去年的公社化运动，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即所有制问题上，可能是跑得太快了，其结果是“一平、二调、三收款”；等等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这年6月24日编印的《政治工作简报》上，有一份材料说，据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和海南军区政治部报告，少